

林台码头经济兴盛的“单县记忆”

民国时期以来的各种版本的《单县志》均记载,林台在单城南十八里,三台连峙,高耸相望,传为汉代转运与防御之所。如今,在单县曹庄乡李庄村附近的偌大一片湿地下,依旧残存着林台古镇的遗址。

林台古镇坐落至上古名泽孟渚泽的中心区域,水陆交通优势非常显著,早在汉代以前就设置了船只停泊港口和货物转运码头。

民间传说,西汉高后吕雉随汉高祖刘邦省亲故土单县终兴镇潘庄村(今曰称谓),返回长安之前,刘邦、吕雉在林台停留了两天,意在“召见”一种背负“七彩龙纹”的神龟。当地官员岂敢怠慢,指派众人踏遍孟渚泽寻觅,终获“七彩神龟”。刘邦、吕后欣喜,认为神龟显现定是好兆头,大汉基业必将稳固、前程锦绣光明,遂将林台镇更名林台城,予以褒奖。

据说,时至今日,位于孟渚泽遗址的浮龙湖还有这种“七彩神龟”,只是其传说中的光鲜荣耀已不复存在。



林台古镇遗址出土的巨型陶器

汉光武帝刘秀南阳登基后,曾专程来到林台城,在其当年被王莽追杀隐身的地方修建了龙国庙、玄井亭、青罗庄等纪念性建筑物,还把亡命之时一老者送与的面食命名“光武壮馍”,至今仍在单县南部一带民众中流行。值得一提的是,刘秀还划拨巨款,扩建了林台码头,加固了林台城池,并在城中建造了一座49米高的砖塔,成为林台城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。

如今,在林台遗址的沼泽中,考古者可窥探到古建筑屋脊上置放的瓦质或陶质的兽形装饰。这些建筑装饰物就是古籍记载的“脊兽”。古人认为以兽镇脊,可避火消灭于两坡瓦陇交汇点,以此严密封闭,避免雨水渗漏。所以说,从水下打捞“龙吻”“龙头”等兽脊装饰,或可揭开“水下有龙角”的秘密。

据记载,距离林台城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城镇,名曰赤龙镇。康熙年间的《单县志》如此记录:“南宋金时,单州团练韩公良臣督造赤龙战船置于此故名。”韩世忠曾任南宋时的单州团练使,其夫人梁红玉随其任上,为民间颂扬至今。南宋时期,赤龙镇坐落在如今的滦河畔,其战略位置尤其重要,为林台码头的上游屏障,凸显水上地理交通优势,被誉为“扼据滦河要塞之险,护林台城防之口要”。

由此足以看出,林台城及其航运码头较早的军事防御设施就在赤龙镇,为林台驻军防御寇敌之需。此与民国版本《单县志》对林台的“三台连峙”之说非常吻合,三台即青龙砖塔、赤龙镇、林台。亦佐证了单县关于汉、唐两代分别设置水运码头和战略防御的目的是一致的,前者出于商业所需,后者出于军事所要。水路交通便捷,使之具备了成为航运码头停泊船只、转运货物所具备的有利条件,当朝出于军事目的和战略地位,在这里设置重镇,事实上为林台城及其码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商业契机。



林台码头遗址

因此证明,当时的林台城和赤龙镇为孟渚泽区域最繁华的城镇,也是古代黄河流域较早的航运贸易集散地。可惜的是,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黄河泛滥,林台城、赤龙镇及其林台码头被淹没殆尽,曾经的辉煌永恒尘封于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近年来,单县民俗文化传播者、民间文物收藏家刘峰在林台及其码头遗址上,斥资建设了林台民俗文化村,展出文物上万件,恢复林台及其码头部分风貌,让当今的人们直观远古水泽一隅曾经的行商坐贾、河运码头所主导的经济社会兴盛繁荣的景象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琨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杨花园

杨花园村位于曹县城西北22.8千米,韩集镇政府东北7千米处;全村总面积1.24平方千米,其中耕地面积0.96平方千米,村落占地面积0.28平方千米;聚落呈南北长方形,长约近600米的南北街一条,长约400米的东街四条;全村360余户,1100余人,有杨、范、裴、李、张等五姓。杨姓为多。

据《杨氏宗谱》载:“吾杨氏祖居山西洪洞。明朝初年吾始祖任兵马指挥使,讳效曾,字子舆,亦慕鲁圣地之文风高尚,遂将家户迁往鲁省单县城东杨洼,生子龙起;龙起生子文耀,次子文选,三子文兴。永乐四年(1406年),文兴公迁此,并辟建花园,故名杨花园。原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,党委会副书记杨用信出生于该村。”

杨用信(1918.5—1987.5),抗战初期参加革命,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7月任中共曹县(西北)县委宣传部长。1942年2月任中共定陶县委书记。杨用信以身作则,生活朴素,平易近人。在工作、思想和生活作风上给同志们树立了榜样。如:1943年开展大生产运动,县委机关在白菜王庄东头庙后划分了一块公地,秋后播种小麦,他与县长马冠群带领县直机关干部推粪车、拉犁耙、拉耩播种,样样都干。当时,“县委书记、县长拉犁子”被传为佳话,群众说“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,共产党做到了”。

1944年1月,杨用信任中共齐滨县县长。他有胆有识,是党的一位优秀干部,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杨用信先后担任贵州省遵义地委秘书长、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、专员公署专员、中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书记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,党组副书记。

身经百战、勇于担当的杨用信是杨花园村的自豪,而杨秀文、杨明显、杨明如、朱进虎等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更是杨花园村的骄傲。其中,历任中共东垣县委宣传部长,定陶县二区区委书记、城关区委书记,齐滨县四区区委书记,齐滨县县委宣传部长,曹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秀文的事迹仍广为传颂。

杨秀文(1921.11—1948.10),字鼎臣,1938年9月参加革命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对敌斗争坚决,果断勇敢,身先士卒,主动出击,歼灭了不少伪顽杂势力,壮大了革命力量,为党的组织建设、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,深受群众的爱戴。1948年4月,杨秀文在战斗中不幸受伤,养伤期间,被叛徒告密,被捕入狱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,威逼利诱,他坚贞不屈,视死如归,严守党的机密,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。同年10月,在菏泽慷慨就义,年仅27岁。

先烈用赤诚染红的杨花园村,明属大丰都,清属大丰里,民国先后隶属于曹县第四区、齐滨县第四区、曹县第六区,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红星人民公社、北李集人民公社、砖庙人民公社、申楼人民公社、申楼乡,2001年,申楼乡撤并,归属韩集镇至今。

杨花园村后倚东鱼河,面临四支沟,村民借水利之便,兴建家庭企业,发展种植专业合作社,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吹拂下,过上了花香四溢、宜居乐业的生活。

鄯 鸿 张荣昌



写对联

儿歌曰:俺爷爷,会画画,拿笔就像铰麦茬;三笔两笔画个鸡,嘴叨小虫翅膀炸。俺二叔,会写字,拿笔就像去犁地;福字一写八道湾,寿字一笔连到地。人人都说书画好,我拿书画当火烤。

农村人崇尚文化,能写会算的人备受尊崇,如果再会写写画画,能临摹书法字帖,会画山水花鸟,那就更让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庄稼汉们刮目相看。

谁家孩子定媒要换书,谁家门市开业要写对联,甚至丧事的挽联,都离不开会写毛笔字的先生。特别是春节时,家家都要贴春联,大家提前几天就买好红纸送到家中,这正是会书画的先生大显身手的时刻。

其实,这些书画先生也没多高的艺术造诣,有的是跟学校老师学的,有的就是临摹过几天字帖,庄稼人也不知道水平高低,更没有艺术鉴赏力,他们认为画得像的、色彩艳的就是好画,寓意好的就合乎心意。画一丛牡丹象征富贵,画一高山寓意靠山,画几条鱼寓意“连年有余”,至于深远寓意、高古的境界,他们全然不懂。写字也是一样,写的方正工整,与字帖上很像,就是好字,至于用笔、结字、章法、墨法,他们一概不顾。因为懂行的少,书画师们更是无所顾忌,画面的泼墨酣畅,写字的龙飞凤舞,更是赢得周围人的声声喝彩。在农村,最常写的对联是: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。最常画的画面是松鹤、仙桃寿星、“连年有余”。

其实,在偏远的农村,作品不在乎艺术品位高低,符合主人的审美要求,大众都说好,就是好字,就是好画。

文/丁明辉 画/王世会

书法是中国文化艺术中的瑰宝。自从毛笔诞生以来,在历史上诞生了许多有名的书法家,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在成武县,如今还存留着不少历代的名家名碑,经常有各地文人墨客前来瞻仰,这些“石上烟云”已经成为该县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虞世南书《孔子庙堂碑》

虞世南是中国南朝陈至隋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,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。

唐高祖武德九年(626)八月,李世民即皇帝位,到了十二月廿九,为了加强统治,他特地封孔子的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。为了记述这件事,特命虞世南撰文并书写,并刻石立碑。碑成后,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观看拓碑,不久,碑毁于庙火。因此,碑文拓片更显珍贵。

北宋时,成武人庞籍在朝为宰相,携来《孔子庙堂碑》拓本复刻,立于成武庙内。据了解,只有陕西西安市与菏泽成武县存有《孔子庙堂碑》刻石,并且有拓本。这更显得成武刻石的珍贵。为什么庞籍会在家乡刻此石碑呢?并不仅仅因为他要为家乡办好事,而是此碑文中提到了成武,也就是自己的家乡。碑文中有“莞尔微笑,若听武城之弦”的表述。这里的“武城”,经菏泽历史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副会长徐子红先生考证,现在的成武在春秋、秦、汉、唐、宋历代曾称“武城”,并与“成武”交替使用。如南宋王称所编写的《东都事略》就说庞籍是“单州武城人”。

大约庞籍在当时也知道这个来历,所以,此碑刻于家乡,也是很有意义的。该碑书法俊朗秀逸、平和俊雅,是虞书中的上乘之作,而且为当时的学子练习书法提供了范本,功不可没。

赵孟頫书《张成碑》

赵孟頫是南宋至元初著名书法家,与欧

“清河郡伯”。为了光宗耀祖,张孜邀请自己的好朋友、翰林元明善撰写了碑文,因为元明善是清河人,有了这一层渊源,在写碑文时,他写得非常用心。好文还须好书法,张孜又找到了赵孟頫,这个时候的赵孟頫正是书法成就最好的时期,于是,他欣然接受。延祐二年(1315),此碑落成,高4.4米,宽1.2米,厚0.44米,螭首龟趺,高大宏伟。因文、书、石均佳,被称为“三绝碑”,受到后人珍视,历代常

石上烟云

——浅谈成武县名家名碑

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并称“楷书四大家”。他能诗善文、书法绘画等都非常擅长,是一位全才式的人物。

张成是元代成武县小房里(今成武县南鲁集镇白海村)人,那么,张成是否与赵孟頫认识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为什么赵孟頫为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碑文呢?这是因为张成的长子张孜的缘故。

张孜在元代时官至两淮都转运盐使,两淮指的是淮南、淮北。当时,这个衙门在今江苏泰州市,掌握江南盐业命脉,向两淮盐商征收盐税。盐运使是从三品官,这个职务是当时最“不差钱”的。张孜担任这个职务后,他的父亲张成早已去世十八年,父以子贵,按当时的规定,也被朝廷授予多个“荣誉称号”,因为张姓的祖源地是清河,所以张成被迫赠封号

在古有“天下之中”之称的定陶,西汉时期曾走出过一位魏相。他出生在一个寒微的农家,关心百姓,熟络农事,走向仕途后,一再劝诫朝中大臣,要自律勿伤农本;劝谏皇帝勤政爱民,为百姓减轻了诸多负担。

据定陶区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王建新介绍,魏相能够脱颖而出,是缘于他的自幼聪明好学,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和孜孜以求。西汉后期,儒学成为当时治国安邦的指南,魏相尤其对《易》爱不释手,因《易》是六经之首,富含辩证思想,许多人都认为它蕴藏着“大道之源”,魏相就细读深究《易》中之奥妙玄机,苦心思索钻研,渐渐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。

在西汉初期,为了恢复因秦末战争而残破衰败的社会经济,朝廷实行“黄老无为”的道家治国理念。到了汉武帝时期,随着国力转向强盛,治国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。武帝笃信“外儒内法”,其严刑酷法和苛刻赋役,不断加剧了内外矛盾。到了汉武帝晚年,社会经济趋于凋敝,社会矛盾日益加剧,出现了动荡的苗头。形势逼迫之下,汉武帝被迫颁布轮台诏书,宣布罪己,承认此前施政错误。遂决定转变内外政策,扭转严刑峻法、横征暴敛的旧政策,实施富民重农、减轻苦恢复国力的新政策。

随着社会经济趋向繁荣,过度役民的思潮再度泛起。魏相担任宰相后,主张减轻百姓负担,坚决遏制旧的思潮复起势头。他上书宣帝,劝其减少对外征伐。目的之一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与痛苦,使其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。

元康二年(公元前64年),北方匈奴袭击西汉在西域车师屯田的军队。因有汉军的坚守,匈奴始终无法攻破车师,汉宣帝派常惠率张掖、酒泉起兵救援,迎屯田士卒还渠黎。救援成功后,宣帝与魏相、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,认为可以趁着匈奴衰弱,出兵击其右方,致使匈奴不敢再度侵扰西域。

魏相注重体察民情,关心百姓疾苦,屡次上书奏请“平冤狱、宽租赋、弛山泽破池、禁株连酿酒积”。拳拳爱民之心溢于言表,见诸史册。他关心灾荒救济,特意提出“本于农而务积聚,量入制用以备凶灾”的主张,反对国家铺张浪费,主张量入为出节约资源以防备灾荒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还坚持认为百姓反抗是朝廷剥削压迫的结果。他指出,由于朝廷政策失误,造成百姓衣食无着,丧失了基本物质生存条件,所以不得已而触犯了刑科。又说:“君动静以道,奉顺阴阳,则日月光明,风雨时节,寒暑调和。”就是说,要求皇帝行政遵循阴阳调和的自然规律,不可恣意行事,过度透支民力。

魏相在茂陵为政期间,严征豪强政绩卓著,没过多久便升任为河南太守。接下来,他继续执行整顿吏治、惩办贪官的政策。为了赈灾济困核查官员,他身体力行,不畏繁难,考察各地实情,从而察微知变,秉实相报,具有防微杜渐的远见卓识。

在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同时,注意减轻百姓负担,奖励耕织。为了防止官员侵害百姓利益,魏相进一步致力于弊政与吏治的整顿,大力施行改革选优劣汰,京师和朝中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吏中选拔,对那些庸碌钻营之輩随时给以罢免。由此,魏相被史称为“汉史良吏,于是为盛,称中兴焉。”

王义尚



任满后在林县西黄华山寺读书,自号“黄华山主”。成武县博物馆内藏有其诗碑四通,是其在黄华山时所作。

王庭筠从没在成武或周边县任职,诗碑如何会在成武呢?这件事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过。嘉庆二十三年,江西崇仁人朱光照(字莲亭)任成武知县,他与同乡好友、河南杞县知县甘扬声是深交,甘扬声是有名的书法家,朱知县就专门把此碑拓片寄给他,让他考证。

甘扬声取出珍藏的云南大理府双塔寺石刻来对比,这副石刻与朱知县寄来的相同,只是字稍异。但他只是推测王庭筠曾经在河北馆陶任职,与成武相近,可能有人慕名携帖刻于成武。

另外,成武县流传有王庭筠瓜皮写诗碑的故事。说是金代某年,成武修文庙,准备写四块石碑装潢门面,到了写碑那天,知县因为围观百姓太多而紧张,迟迟不敢落笔,云游到此的王庭筠见此,在知县的虚让下,竟然拾取西瓜皮蘸着朱砂写了四块诗碑,流传至今。此碑字势矫健,飘飘有仙意,有“半山飞雪舞天风”之感,是该县博物馆的石刻书法珍品之一。

张长国 朱琳

